



作为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诞生、发展起来的国际性城市，上海所具有的中西交融、南北汇聚、变化更新的城市特性，催生了无数个“第一”，也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石。

上海为何能诞生无数个“第一”



一个源头：

工业文明与工人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初心和使命中内含着工业化的任务。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早在1861年就有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电机缫丝厂。1919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据《新青年》的调查，这一时期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人口才200万，工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同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不到5%，上海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精神源头，与上海机器大工业、工业文明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民族资本根本没有办法与之竞争。李鸿章办洋务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但洋务运动总体上只兴利不除弊、只布新不除旧，无力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集中了约50%的民族资本企业、约40%的资本额、约50%的年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大工业的文明特质，不仅赋予了工人阶级鲜明的属性，而且成为孕育红色基因的母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来源。

一大优势：

中西交融与南北枢纽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经过艰难求索才找到的救国真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近代以来，大中城市人才汇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其独特的



“华洋杂居”等城市特质，更是为红色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独特空间。同时，相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西方思潮”。而上海对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所持有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姿态，以及立足社会生活实际加以利用改造创新的文化性格，又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红色文化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刊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翻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首次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事实上，《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诞生于上海，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建立于上海，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于上海，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亦制定于上海。此外，上海还有《民国日报·觉悟》《星期评论》《太平洋》等名刊，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主阵地。

方便的信息交流，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年，俄共代表在上海办起了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逐步

转变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不仅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牵引作用，而且对其行为也发挥了动力推导作用。一部分人开始充分利用上海拥有全国最为壮观的工人阶级队伍以及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登上政治舞台的独特优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的相结合。

一种气魄：

锐意创新与敢为人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披荆斩棘的开拓创新。

在军阀混战、兵痞流氓横行的血雨腥风中，要突破无数阻力、克服万种艰险，成立一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新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开天辟地的胆略和勇于创新的气度。这样的敢为人先，与不保守、不因循守旧的上海城市气质和文化血脉是交织在一起的。

相较于此前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夜郎自大、愚昧落后，上海以开埠以来所形成的锐意革新、俯瞰广远的胸襟和气魄，使其成为更多的“第一”所在地。这里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影响深远。它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所工人学校也出现于上海，即1920年秋开学的上海工人补习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建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创办于上海，等等。这些创党时期的数个“第一”集中出现于上海，与上海挺立时代潮头的特性密不可分。而这正是奠定上海红色基因的密码。

进一步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仅是流淌在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文化血脉，而且是上海领风气之先的精神支撑。今天，改革开放再出发，必须继续传承这一红色基因和精神传统。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过程中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进而把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解放日报》
文/梅丽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史海钩沉



最早本是仪仗

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外出的人们总免不了撑起一把伞。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雨伞的国家，至今大概有3500多年的历史，当时人们称伞为“簦”。《国语·吴》中就有“簦笠备雨器”的记载。《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则记载了虞卿“蹶蹶担簦”冒雨前往赵国游说孝成王的史实。到了后魏时期，伞被用于官仪，老百姓将其称为“罗伞”。官阶大小高低不同，“罗伞”的大小和颜色也有所不同。皇帝出巡要用黄色“罗伞”，以表示“荫庇百姓”，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遮阳、避雨。

伞在中国诞生之后，逐渐传到了国外。日本在唐朝时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批“遣唐使”，多达500余人，他们不仅把中国的历法、天文、音乐、美术等文化带回日本，也把包括制伞工艺在内的多种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带回日本。1747年，英国一位名叫祖纳斯·汉努威的商人到中国旅行，发现中国人打着油纸伞在雨中行走，雨停后把伞一收，随身携带，甚为方便，回国时便买了一把。回去后不久，正逢一个雨天，他便撑开带回去的那把雨伞在伦敦街头行走。当时英国的宗教传统认为：天上下雨是上帝的旨意，用伞遮住雨就是违反天意，是大逆不道的。汉努威因此受到嘲骂和诅咒，甚至有人向他投掷鸡蛋。但是，雨伞的好处却人人可见，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逐渐盛行起来。到19世纪中叶，雨伞成了英国人的生活必备品，而且用伞也成了英国人的一种荣耀。

如今，伞的家族更是子孙繁衍、款式众多。有置于案头、茶几上的灯罩伞，有直径达两米多的海滨浴场遮阳伞，有折叠自如的自动伞，还有用于装饰的小小彩色伞……随着科技发展，伞的样式、功能也在不断求新。日本出现了一种十分别致的伞，伞柄上装有收音机，伞一撑开，就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另外，日本人还针对通常的伞不能避免鞋子被雨淋湿的情况，发明了一种鞋伞。这种伞立于鞋尖之处，下雨时撑开就可以防止鞋子和脚被雨淋湿，但在伞不撑开时，它在鞋子的头部却是一种装饰。国外还有一种带香味的伞，伞一打开，芬芳浓郁。可以想象得到，在雨中打着这种伞，心情该是何等舒畅。

摘自《光明日报》